

清华简《程寤》、《保训》文王纪年探研^{*}

陈颖飞

提 要 简本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、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,是迄今仅有两例“唯王”格式的文王纪年材料,这两个纪年体现了受命之年称王与即位称王两说的矛盾。辨析先秦文献中的文王纪年材料,证明《程寤》简“唯王元祀”不可能是即位年,这两个文王纪年应源自两个体系;并据金文等纪年格式对其逐一断代,可推断《程寤》简“唯王元祀”的写定年代可能是西周中期,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则可能是西周晚期或更晚。文王“受命称王”至迟西周中期已流行,“即位称王”出现较晚,疑不超过西周晚期。

关键词 简本《程寤》 《保训》 文王称王 文王纪年

清华简第一辑有两篇简文开篇直接记录了周文王的纪年,一是《程寤》的“唯王元祀”,另一是《保训》的“唯王五十年”。两篇简文皆无篇题、序号;形制都很独特,前者约44.5~0.6厘米,后者则28.6~0.5厘米;字体皆与同辑发表的其他篇不同,但仍是楚文字,前者较典型,后者有美术化的特点。

清华简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、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,是迄今唯有的二例含“唯王”的文王纪年。《程寤》的“唯王元祀”,即周文王纪年之元年,是文王受命的标志,应指“受命称王”。《保训》的“唯王五十年”,作为文王纪年的末年,说明文王“即位之初即已经称王”。^① 文王“受命称王”,还是“即位称王”,传世文献中两说已难调和,而清华简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与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,各持一说。本文试从探究这一矛盾从发,考辨先秦文献所见文王纪年材料,讨论两说写定的年代。

清华简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与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,系文王受命纪年与即位纪年的矛盾,体现了“受命称王”及“即位称王”之争。

清华简《保训》发表后,已有学者围绕“唯王五十年”对文王受命、称王等问题进行了

^{*} 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”(09JZD0042)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“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”项目课题“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”(2010BAK67B00)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金《西周史新探——以〈清华藏战国竹简〉为中心》(第四十六批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刘国忠《周文王称王史事辨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2009年第3期。

考辨,^①有的提出文王“即位之初即已经称王”,但随着《程寤》简的发表,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。^②

“文王称王”究竟是受命而王,还是即位称王,各有传世文献为依据。清华简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与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,作为确切的文王纪年,对以往的材料或说法,分别可印证。传世文献中,“文王称王”较早材料,有以下8条:

1. 文王曰“女以为何也?”武王曰“西方有九国焉,君王其终抚诸?”(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)
2. 五年之初,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,文王出则克黎,六年伐崇,则称王。(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正义引《殷传》)
3. 诗人道西伯,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。(《周本纪》)
4. 周西伯政平,及断虞芮之讼,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。(《齐太公世家》)
5. 文王受命,改正朔,布王号于天下。(《易纬·乾凿度》)
6. 文王比隆兴始霸,伐崇,作灵台,受赤雀丹书,称王制命,示王意。(《易纬·是类谋》)
7. 西伯既得丹书,于是称王,改正朔,诛崇侯虎。(《春秋纬·元命苞》)
8. 文王即位四十二年,岁在鹑火,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,始称王矣。(《帝王世纪》)

纵观这些“文王称王”的材料,大多与“受命”相关。这8条材料中,6条为受命称王,以致后世讨论“文王称王”时与“文王受命”密不可分。

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系受命之年称王,与司马迁、纬书及《帝王世纪》等传世文献相合,又以司马迁的说法最早。

1. 诗人道西伯,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。(《周本纪》)
2. 周西伯政平,及断虞芮之讼,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。(《齐太公世家》)

司马迁的这一记载源于解《诗经·文王有声》:“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。”但《文王有声》没有直接说西伯在受命之年称王,而《齐太公世家》所谓“曰文王”,不仅称王了,且已“曰”“文王”,“文王”似为生称,与《周本纪》“谥为文王”不同。实则不然。《齐太公世家》所谓的“曰”,当指前文的“诗人”“曰”,疑以《文王有声》“文王受命”的“文王”替换为“西伯”,即“西伯受命曰文王”。

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则显示文王即位称王。这与王国维“古诸侯于境内称王”的说法可呼应。尽管“文王称王”之说文献中频见,但仍有不少学者否认“文王称王”,主要原

^① 参看:刘国忠《〈保训〉与周文王称王》,《光明日报》2009年4月27日;刘国忠《周文王称王史事辨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2009年第3期;刘国忠《清华简〈保训〉与周文王事商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;王辉《清华楚简〈保训〉“惟王五十年”解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9年第6期;刘光胜《由清华简谈文王、周公的两个问题》,《东岳论丛》2010年第5期。

^② “文王称王”问题的研究史,多有学者梳理,参看王晖《周文王受命称王考》,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4期;晁福林《从上博简〈诗论〉看文王“受命”及孔子的天道观》,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,2006年第2期;刘国忠《周文王称王史事辨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2009年第3期。

因是《论语·泰伯》“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”与“称王”相矛盾。^① 王国维针对这一点,提出“古诸侯于境内称王,与称君、称公无异”,使“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”得以合理。^② 王国维主要以西周晚期徐楚吴等国铜器铭文为立论的基础,而且数量较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张政烺撰文证明周金文中称王者皆为异姓,并非周室封建诸侯。^③ 换言之,那些称王的诸侯国属于戎狄蛮夷之列。^④ “周”虽与商异性,但属于商的诸侯,应不属此例。王国维的“古诸侯于境内称王”说不适用于周文王。

文王即位称王之说,并非始于王国维,东汉郑玄已倡。《书·无逸》曰:“文王受命惟中身,厥享国五十年。”郑玄注“受命,谓受殷王嗣位之命”,依据的是孔传“文王九十七而终。中身,即位时年四十七。言中身,举全数。”“文王九十七而终”出自《礼记·世子》,孔安国据此解“中身”为四十七岁,指的是即位之岁,郑玄便得出“受命”是“受殷王嗣位之命”的结论。或许出于这一认识,郑玄注《礼记·大传》“追王太王亶父、王季历、文王昌”曰:“文王称王早矣。”^⑤

值得注意的是,既然“受命”是“受殷王嗣位之命”,那么受命的结果就是“即位”,因此“即位”、“受命”、“称王”三事统一了。如果这一说法成立,《程寤》简“唯王元祀”便是文王即位年,与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的纪年相容。但此说难以成立。

首先,郑玄的文王“受命”是“受殷王嗣位之命”之说不合史实。郑玄所据《无逸》“文王受命唯中身”没有相印证的文献,且经伏生口传等原因,《书》间有错漏,仅凭“中身”一语得此推论,已难取信。与此相反,《诗》、《书》等西周文献,以及西周金文,乃至《程寤》简多有明文直书文王受的命是天之命,受命内容是代商治理民众与土地,即“厥邦厥民”、“受民受疆土”。如:

1. 文王在上,於昭于天。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(《诗·文王》)
2. 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;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。(《诗·文王有声》)

① 否定“文王称王”所据材料有三,另两条为:1、文王帅殷之叛国以服事殷(《左传》襄公四年);2、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,追王太王亶父、王季历、文王昌(《礼记·大传》)。这些材料虽属先秦,但不能充分证明文王未称王。“服事殷”出自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,距商末已久远,又是儒家观念,未必属实。即便从形式上是如此,但实际政治斗争要复杂得多,很可能这商末殷周关系的一方面。《程寤》简揭示了这一时期殷周关系的另一方面,简文曰“商威在周,周威在商。”文王把商看作周的忧患,这一记载与传世西周文献相符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记文王伐犬戎、密须、崇、黎,是此思想的具体执行。尤其是“崇”、“黎”乃商的屏障,文王征伐这些国,不是为了“率殷之叛国以服事殷”,而是扫清灭商的道路。

② 王国维《观堂别集》卷1《古诸侯称王说》,见《观堂集林》(下),北京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1152—1153页。

③ 张政烺《矢王簋盖跋——评王国维的〈古诸侯称王说〉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3辑,北京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④ 蒙文通“金文僭有王号而莫可考者甚众,自皆为夷狄。”(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》,第18页)据王世民统计,西周金文中,“并非天子的称王之例,共计不过十多条”,并将这些“王”理解为同周天子并无受封和统属关系的“他邦”君长,即包括某些以姬、姜为姓者在内的氏羌首领”(《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83年第3期。)

⑤ 孔疏“土无二王,殷纣尚存,即为早。所以早称王者,案《中候·我应》云‘我称非早,一民固下。’注云‘一民心,固臣下,虽于时为早,于年为晚矣。’”按照孔疏的理解,文王称王是在晚年,郑玄所谓的“早”是相对殷尚未亡而言。据上文所论,这应非郑玄的本义。

3. 敷前人受命,兹不忘大功,予不敢闭。于天降威用……天休于宁王(宁王,指文王,下同——编者),兴我小邦周,宁王惟卜用,克绥受兹命。(《书·大诰》)
4. 天乃大命文王,殪戎殷,诞受厥命,越厥邦厥民。(《书·康诰》)
5. 我道惟宁王德延,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……君奭,在昔上帝,割申劝宁王之德,其集大命于厥躬……乃惟时昭文王。迪见冒闻于上帝,唯时受有殷命哉。”(《书·君奭》)
6. 惟时上帝,集厥命于文王。(《书·文侯之命》)
7. 肆文王受兹[大命]。(何尊,集成 6014)
8.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……先王受民受疆土。(大盂鼎,集成 2837)
9. 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,受商命于皇上帝。(《程寤》简)

这些西周材料,尤其是出土文献,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,年代明确,无可辩驳的证明,在西周早期文王受命已是受天之命代商,而绝非郑玄后来所谓“殷王嗣位之命”。

其次,《程寤》简“唯王元祀”不可能是文王即位年。证据至少有三条。第一,与今本《程寤》佚文“文王去商在程”这一时间不合。^① 尽管简本没有此语,鉴于今本其他佚文都与简本相合,不能轻易否定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帝王世纪》则作“文王自商至程”,上文曰:“文王合六州之诸侯以朝纣,纣以崇侯之谗而怒,诸侯请送文王,弃于程”,记纣听信崇侯的谗言囚文王事始末。囚禁时间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有明载“纣囚文王七年”,而“文王自商至程”即文王囚后释归的时间。此时文王已被囚了七年,之前便能“合六州之侯”,不可能是即位之初,即“文王自商至程”不能发生在文王即位年。^② 第二,文王“受命”年数有《尚书大传》与《周本纪》的“七年说”、《逸周书·文传》与刘歆《世经》的“九年说”、《周本纪》太史公曰的“十年说”三说。^③ 无论哪种说法,《程寤》简“唯王元祀”都不可能是文王即位年。第三,与成王即位的年龄也不能相应。如果文王即位已称王,那么成王即位时已距受命至少有六十余年,而《程寤》简载拜梦后,文王给太子发讲了“商戚在周,周戚在商”这类深奥而又政治意味的训戒,太子发的年龄不可能太小,即便仅七八岁,死时也已超过七十岁,而生成王的年龄便接近六十岁,成王还有弟弟唐叔虞,这不太合情理。

根据以上分析,《程寤》简的“唯王元祀”不可能是文王即位年,当是受命后的改元,既然已经改元,文王临终前的纪年绝不可能是“五十年”,即《保训》的“唯王五十年”便不能成立。换言之,这两个纪年不能兼容于同一纪年体系。

如何理解清华简中文王纪年的矛盾?梳理文王纪年材料,可进一步辨析这一问题。

二

先秦纪年方式有王年纪年和大事纪年两大类,目前先秦材料所见的文王纪年共六条:

1. 唯王元祀正月既生魄,太姒梦见商廷唯棘……。(《程寤》简)
2. 唯王五十年,不豫。王念日之多歷,恐坠保训。(《保训》简)

① 《太平御览》卷 397 引。

② 今本《竹书纪年》认为此事发生在帝辛二十九年,“二十九年,释西伯,诸侯逆西伯,归于程”,以同书两条材料“四十一年春三月,西伯昌薨”及“文王在位五十年”推定,系文王即位后的三十八年。但今本《竹书纪年》的真伪尚有争议,不能作为定论。

③ 《史记》有文王受命“十年”的记载,疑为“七”之误。

3.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,九州岛之侯咸格于周。王在酆。(《逸周书·酆保》)

4. 维三十有五祀,王念曰“多□,正月丙子拜望,食无时……”(《逸周书·小开》)

5. 维周王宅程三年,遭天之大荒,作《大匡》,以诏牧其方。(《逸周书·大匡》)

6. 文王受命之九年,时维莫春,在郾。(《逸周书·文传》)

前四条材料是王年纪年,其中 1、3 又并历法纪月,后两条为大事纪年。1、2 出自清华简,1 又为《逸周书》佚篇,3 至 6 出自今本《逸周书》。换言之,以上六条材料,至少五条出自《逸周书》。

3、4 两条材料,即《酆保》“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”、《小开》“维三十有五祀”,注家多认为有错字,尤其《酆保》“维二十三祀”与下文的“王在酆”冲突。主要有三种说法。1、仍系文王纪年,“二十三”是“四十三”之误,“文王四十三年十一月为庚子朔,盖古文‘四’字积画相重,故误耳”。^① 2、是商纣王(帝辛)纪年,“二十三,宜作‘三十五’”。^② 3、是武王纪年,《酆保》“维二十三”之“二”、《小开》“维三十”之“三”都是“王”字之误。^③

这些解释,都是改字,缺乏足够的证据。说法 1 与古文字不合。战国古文的“四”或可因笔划不清误为“二”、“三”,但“二十”、“三十”、“四十”都是合文,一般分别写作𠄎(信 2. 12)、𠄎(包 117)、𠄎(包 269),“𠄎”有“十”形,不似前两例的“十”是共享笔划,不太可能“积画相重”由“𠄎”、“𠄎”误为“𠄎”。说法 2 所据文献尚有争议。其据今本《竹书纪年》“帝辛三十五年,西伯自程迁于丰”推理而来,此书的真伪尚有争议,将“二十三”作“三十五”不妥。说法 3 以“二”、“三”误为“王”,认为是武王纪年,文意字词恐不合。《逸周书》序曰“文王在酆,命周公谋商难,作《酆保》”,与文中“九州岛之侯咸格于周”这一背景相合,不太可能是武王时期发生的事。此外,《逸周书》中不少篇的篇末都有“训诫文体的一种惯用语”,^④值得注意的是,记文王的《小开》、《大开》篇尾“宿不悉,日不足”语,与清华简《程寤》“爱日不足”、《保训》“日不足,唯宿不秉(详)”一致,都是文王训诫武王的话,而记武王的篇中,这类话表达各不相同,如《小开武》“日正余不足”、《寤微》“戒戒维宿”、《武穆》“余夙夜求之无射”、《武微》“汝夙夜勤心之无穷也”。

无论《酆保》“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”、《小开》“维三十有五祀”这两个纪年是否有错字,《酆保》、《小开》都应是文王纪年,清华简《保训》和《逸周书》武王纪年也可证。清华简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显示文王即位称王,文王纪年既然有“五十年”之说,那么出现《酆保》“二十三祀”、《小开》“三十有五祀”这样的纪年是可能的。而且,《逸周书》的武王纪年有“十有二祀”(《武微》)、“十有三祀”(《大匡》、《文政》),都是从即位开始纪年,文王纪年也有这种可能。

但是,这一说法与清华简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不合。为了解释这一矛盾,以下试对这些文王纪年材料进行断代。

① 朱右曾《逸周书集训校释》卷 3,《皇清经解续编》卷 1030,第 1 页。

② 丁宗洛《逸周书管笺》,见黄怀信等《逸周书汇校集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,第 194 页。

③ 黄怀信《逸周书校补注译》,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,第 27、31 页。

④ 李学勤《清华简九篇综述》,《文物》2010 年第 5 期。

三

这六条文王纪年材料可归为四类:

- A. 唯王某祀 (1 清华简《程寤》)
- B. 维某祀 (3《鄠保》、4《小开》)
- C. 唯王某年 (2 清华简《保训》)
- D. 某王某事(之)某年 (5《大匡》、6《文传》)

与金文、其他文献中的纪年格式对比,或可推断其大致时代。^①

A、“唯王某祀”是以“祀”纪年的一种通行格式。商代铭文皆以“祀”纪年,一般以“日名”开篇,以“(某月)唯王某祀周祭日”结尾,月偶置于周祭日后,如小臣邑罍“癸巳。……唯王六祀,彤日,在四月”(集成 9249)。西周早期铭文,“唯王某祀”置尾的格式仍延续,但“唯某月(月相、日)”前置,一般居篇首,而作为商代历法特征的周祭日则为标志周历的月相所替代,如大盂鼎“唯九月……唯王廿又三祀”(集成 2837)。这一体例西周中晚期仍时有出现。西周中期此类铭文发生变化,“唯王某祀”多居篇首,后面常接“某月(月相)某日”,如师遽簋盖“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”(集成 4214),但仍偶有处于篇末例,如五祀卫鼎“唯正月初吉庚戌。……唯王五祀”(集成 2832)。“唯王某祀”的格式,西周晚期以后的铭文中极少见到,仅战国早期偶见,但“唯王某祀”居首,后无“某月(月相)某日”,如楚王禽章钟、镈。清华简《程寤》:“唯王元祀正月既生魄”的纪年是以“唯王某祀”为篇首并后接“某月(月相)”,应是西周中期的纪年,而《程寤》有可能是西周中期的文献。

B、“唯某祀”是以“祀”纪年的另一种格式,格式 A 省“王”字。^②例子极少,迄今似仅见于战国早期器,如𠙴羌钟“唯廿又再祀”(集成 157—161)。《鄠保》“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”、《小开》“维三十有五祀”属此例,但有所区别。后者以“有”相连年份十位与个位,即金文常见的“某十又某年(祀)”格式,商至春秋金文以此方式连接序数词,战国仍有出现。前者年份的十位与个位直接连接,管燮初称为“意合法”,认为金文中的“意合法”战国时期才出现,使用比“某十又某年(祀)”更普遍。^③据此,疑《鄠保》“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”这条纪年材料或系战国时期写定。此外,张钰哲、张培瑜等学者已指出“朔可能是西周后期才逐步认识并开始使用的”,^④如果此说不误,《鄠保》“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”就不能早于西周后期,这与断代为战国也是符合的。《小开》“维三十有五祀”,因金文“唯某祀”的格式迄今仅见于战国早期,而以“又”(有)相连序数词的纪年铭文一直延续到战国,《小开》“维三十有五祀”这条纪年材料可能写定于战国早期。

① 以下对金文纪年格式的论断系笔者统计分析《殷周金文集成》、《近出金文集录》(一)、《近出金文集录》(二)辞例所得,基本能反映迄今所见金文格式的大貌。

② 除已讨论的“惟王某祀”、“惟某祀”外,还有“王某祀”的格式,例极少,如王七祀壶盖“王七祀”(集成 9551)。

③ 管燮初《上古汉语序数词组结合方式的历史演变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12 辑,北京:中华书局 1985 年版,第 407—418 页。

④ 张钰哲、张培瑜《殷周天象与征商年代》,《人文杂志》,1985 年第 5 期。

C、“唯王某年”是以“年”纪年的格式。金文中省“王”的这类格式,^①即“唯某年”,西周早期已出现并置篇首,西周中晚期流行,春秋时期乃至战国晚期仍有少数例子。“唯王某年”见于西周中期;西周晚期较流行,但不及“唯某年”使用普遍;战国时期偶有例,如曾姬无恤壶“唯王廿又六年”(集成 9710—9711)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西周时期的纪年铭文,普遍后接月、月相、日,西周晚期个别铭文仅有纪年,如叔尊父盨“唯王元年”(集成 4454—4457);战国纪年铭文则相反,普遍仅有纪年而无月相、日名,个别有月名,如令狐君嗣子壶“唯十年四月吉日”(集成 9719—9720),而且“唯王某年”格式后接月名的战国铭文似尚未见。另外,这一格式的春秋纪年铜器似尚未见。^②因此,“唯王某年”虽在西周中期已经出现,但清华简《保训》:“唯王五十年”后未接月、月相、日,可能写定于西周晚期,也不排除更晚的可能。^③

D、“某王某事(之)某年”是以大事纪年。铭文中的大事纪年为“某王某事(之)年”,主要有“年”、“之年”、“之岁”三种。^④仅以“年”为大事纪年,见于西周早、中期铭文,前接地名成周、宗周、镐京等,如作册鬲卣“唯明保殷成周年”(集成 5400)、厚趯方鼎“唯王来格于成周年”(集成 2730)。“之年”的纪年格式,西周早期也已出现,如中方鼎“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”(集成 2751—2752);西周中晚期仍见,有的前缀历法纪年,如爰尊“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,爰从师雍父戍于固次之年”(集成 6008);东周后似未见。“之岁”纪年,见于战国楚金文,战国楚简习见。这些格式的大事纪年,“年”、“岁”等纪年词前无数词,与《文传》“文王受命之九年”、《大匡》“维周王宅程三年”皆不同。这种年前有序数词的大事纪年格式,商周铭文中似未见,传世先秦古籍中也罕见,仅有个别例子可相较。(维)某王+某事+某年的格式,清华简《金縢》篇新见,作“武王既克殷三年”,今本《金縢》则是“既克商二年”,省了王名。今本《金縢》经伏生口传,难免省误,疑简本《金縢》更近于原本。清华简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 305±30 年,即战国中晚期之际。《大匡》“维周王宅程三年”疑以此为下限,有可能上溯至西周。“某王+某事+之+某年”的格式,仅《孔子家语》“周公相成王东征之二年”相似,但《孔子家语》年代有争议,一般认为是汉以后作品,^⑤近年有学者认为

① 除“惟某年”、“唯某年”两种较通行格式外,尚有“某(国名)某年”、“唯某(国名)某年”三种格式。“某年”,春秋已出现,战国时流行且为最普遍的格式,除置篇首外,还常居文中间。“某(国名)某年”、“唯某(国名)某年”都仅见于战国,前者仅梁国器,如廿七年大梁司寇鼎“梁廿又七年”(2件,集成 2609—2610),后者仅越国器,如者钟“唯越十有九年”(集成 120—132)。

② 春秋时期的纪年铜器很少,从目前不多的例子看,仅以“年”纪年,有“某年”、“惟某年”两种格式,后接月、日,有的有“初吉”,如蔡侯尊、盘“元年正月初吉辛亥”(集成 6010、10072)。

③ 杜勇认为《保训》的著作年代为战国前期,所据系《保训》的语言特征、阴阳观念、中道思想,未论及纪年格式。参看:杜勇《清华简〈保训〉的著作年代问题》,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0 年第 4 期。

④ 另有“事岁”、“立事”等格式,相当于元年。“立事岁”为齐国春秋至战国铭文特有格式,“立事”则是赵、燕二国铭文常用格式。

⑤ 李学勤据八角廊《儒家者言》和安徽阜阳双古堆简牍等新出汉简的性质与内容,考辨其为《孔子家语》的原型,《儒家者言》可称为竹简本《孔子家语》。今本《孔子家语》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、孔伋、孔季彦、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,有着很长的编纂、改动、增补过程,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。参看李学勤《竹简〈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,《孔子研究》,1987 年第 2 期。

原本由孔子弟子编成。^①“(维)某王+某事+(之)某年”的格式出现较晚,疑早不超过战国。必须指出的是,这种前缀序数词的大事纪年格式例子太少,有待更多新材料的出现。

综括上述分析,文王纪年六条材料的写定年代大致如下: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. 清华简《程寤》:“唯王元祀正月既生魄” | 西周中期 |
| 2. 清华简《保训》:“唯王五十年” | 西周晚期,或至战国中期 |
| 3. 《鄂保》:“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” | 战国 |
| 4. 《小开》:“维三十有五祀” | 战国早期 |
| 5. 《大匡》:“维周王宅程三年” | 西周至战国中晚期之间 |
| 6. 《文传》:“文王受命之九年” | 战国 |

据此可知,《程寤》简“唯王元祀”写定于西周中期,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则可能写定于西周晚期,或更晚。简本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的撰写年代早于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。

余论

简本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与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,虽同出于清华简,但体现了文王“受命称王”与“即位称王”两个矛盾的说法。本文结合“文王称王”的其他材料,并据金文等纪年格式讨论了先秦文献中的文王纪年材料的写定年代,疑简本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的写定年代为西周中期,《保训》“唯王五十年”为西周晚期或更晚。据此或可推测,“受命称王”的说法较早出现,至迟到西周中期已流行,“即位称王”则较晚出现,最早恐不超过西周晚期;战国时期,这两种说法同时都在流传。

文王纪年材料,除《保训》外,五条出自《逸周书》,这些纪年的断代,对研究《逸周书》的编撰或有一定参考价值。简本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不见于今本佚文,而今本佚文中,仅“文王去商在程”一语不能与简本相印证。为什么出现这一差别?值得注意的是,简本虽记的是时间,今本载的是地点,但后者其实暗含了时间,今本的“文王去商在程”可起到替代“唯王元祀”记叙发生时间的作用。今本《逸周书》将以西周至战国等不同时期记载西周的史料汇合为“七十一”编,以与《尚书》二十九篇成百篇之数,由目前所存篇目看,今本《逸周书》的纪年,用的是即位纪年的方式,疑编者为了体例统一,对于有明显冲突的文字,进行了删改,清华简《程寤》“唯王元祀”或即因此删去。

本文对文王纪年材料的断代,仅据历日而论,对考辨各篇著作时代或可提供参考,但文献流传的情况复杂,删改错乱多见,《逸周书》历经长期流传中的改编,各篇杂芜难辨,仅以历日的断代并不能解决年代问题,尚需结合其他多种因素综合研究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陈颖飞 北京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100084)

(责任编辑 晓 思)

^① 杨朝明认为《孔子家语》由孔子弟子编成,后流传中有散乱,后由孔安国得而撰成今本《孔子家语》。参看杨朝明《读〈孔子家语〉札记》,《文史哲》2006年第4期。